

飞鸟文丛

如果世界是
一堆装在网袋里
的青菜
人类就是青菜上
的蚂蚁

血液与土壤

田松著

鹭江出版社

田 松著 血液与土壤

鹭江出版社

〔闽〕新登字 08 号

飞鸟文丛
血液与土壤
田松 著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编:361009)

福州市南方彩色印刷公司印刷

(福州市福新路 131 号 邮编:350011)

开本 787×1092 1/32 5.625 印张 4 插页 108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—80610—582—4
I·106 定价:9.80 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（代序）

打开书橱时，我常常惊异于80年代上大学时购买的图书，这并不仅是因为在贫困的那时我竟买了那么多书，重要的是那些书的内容涵盖了太多的学科，我不仅读过，而且做过大量笔记。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爱好，这些书几乎成了80年代大学生的必读书，无论他或她学的是什么专业，也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。由这些书散发的书香构成了80年代校园中特有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乌托邦，青春的心灵好像都充溢着神圣的使命，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几乎成了每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自觉的责任，怀疑和批判成了他们对现实中一切事物的态度。

90年代的到来，是对这些60年代出生、80年代求学的一代人的考验。他们还没有在浪漫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，就被卷入一场纯粹市场意义上的商业洗礼。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，其理论本质是自由主义，这与80年代校园中的理想主义一脉相承，但校园中的理想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产物。浪漫主义的空中楼阁落入现实的尘埃，至今我们还能感受到它的震撼。

他们渐变成飞翔的鸟儿，在无尽的扑扇中寻找心目中的良木，追逐着理想的生活和生活的理想。多数人经历过“国

营单位”的工作，然后几经周折，最终选择了自由职业的生存方式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让位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怀。他们曾经耻于将自己与普通大众等同起来，似乎那就意味着平庸、丧失热情、理想消亡。选择了自由就要承受得了自由，在一种尚未规则的经济生活中，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，通过“交换”来实现自己的知识价值。真正面对的敌人已不是外在的现实，而是内心的浪漫主义，随着浪漫主义色彩开始消褪，乌托邦让位于一种基于现实而不是想象的生活。

于是，有了《飞鸟文丛》。

它们的作者都有过相似的心路历程，在经历了撩拨青春思绪的校园熏风和思想殿堂里的漫游后，于真正的生活中理解了80年代所赋予自己的理想主义的社会内涵。他们经受过理想与生活磨合的伤痛，但更深刻地感受了现实赋予精神的丰富性，不再回避生活中的丑陋一面，因为认识到自己身上也有着瑕疵。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，都是作者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体验，它不是文人的闲谈，也不是书斋中的论理，它们叙述的是经过的路、发生过的事、思考过的问题、一种可能的答案……

走过生活的荆棘，经过了生活的沉淀和铅华清洗，他们仍然怀有着一种尚未世故的心情。

思想掠过我的心上，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。

我听见它们鼓翼之声了。

（泰戈尔）

颜玉强

· 目 录 ·

母语的丧失

抚摩母语	(3)
语与文	(9)
语言与人群	(12)
人群与语言	(15)
刀	(19)
语言的模造与生长	(27)
故乡的荒芜	(35)
家	(47)
沙化的土壤	(53)
生活	(57)

模造与生长

一种奇怪的动物	(65)
模造与生长	(72)
运动快感	(84)
暴力	(9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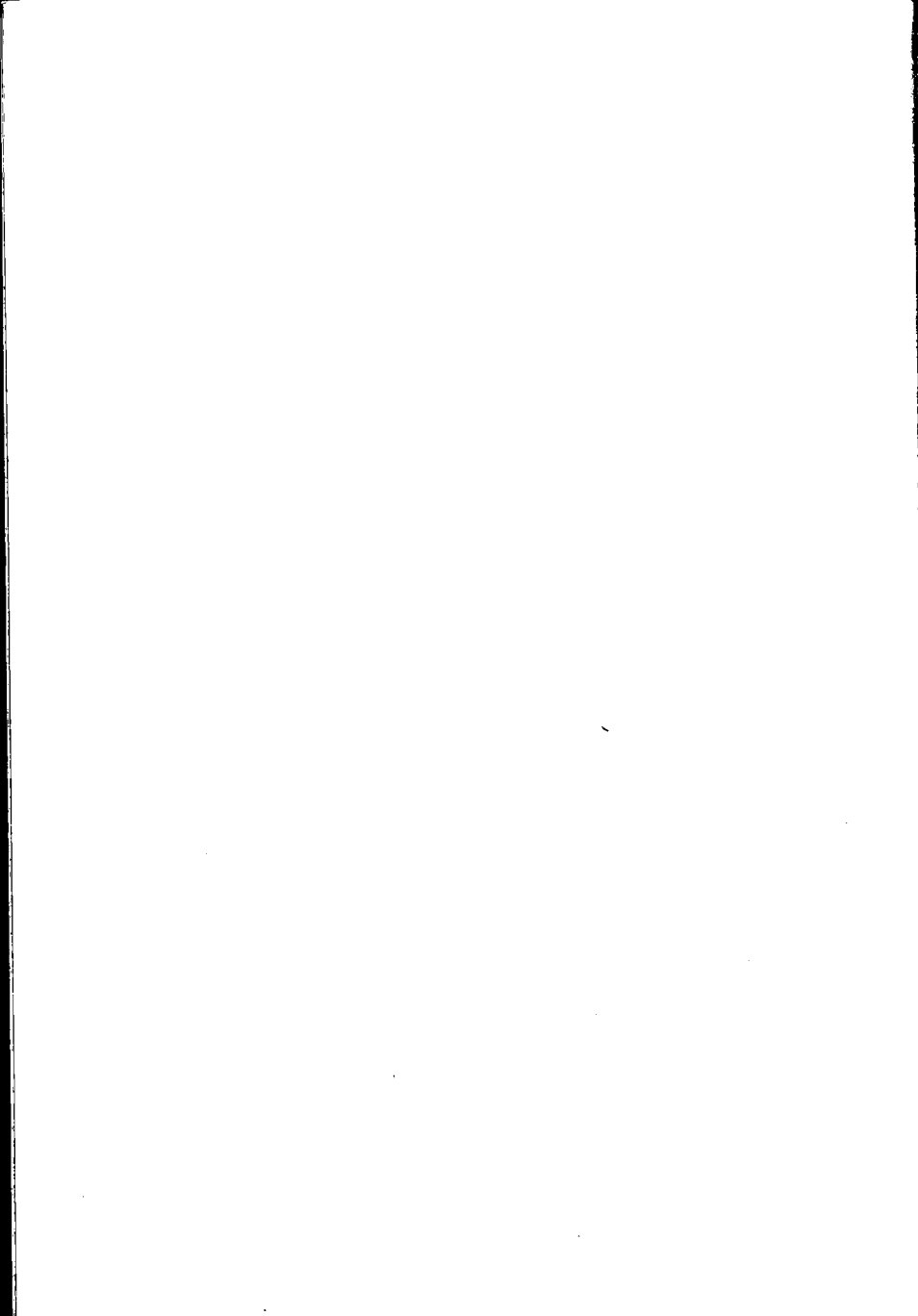
游戏.....	(112)
体育.....	(125)
音乐.....	(131)
歌声.....	(139)

表演时代

表演时代.....	(145)
观赏动物.....	(148)
表演时代的生活.....	(151)
艺术.....	(157)
表演时代的艺术.....	(160)
书法.....	(164)

后 记.....	(168)
----------	-------

母语的丧失



抚摩母语

且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与？未得国能，又失其故行矣，直匍匐而归矣。

——《庄子·秋水》

邯郸学步这个故事我从小就不大相信，再不济也不至于爬着回去。有些本事就像种了牛痘一般，一旦学会就可以受用终生。据说游泳就是这样。一个会游泳的人，不管有多少年没有下过水，只要把他往水里一扔，他的四肢就会自动划起它们熟悉的动作——就算他的脑袋忘了，他的身体还能记得。只要不在水里，只要不是瘫子，路总是应该能走的。但是，如果那位寿陵少年学的不是邯郸步，而是邯郸话，情况就可能完全真实。

1986年，我离开长春到南京读书，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。表演家乡话成了我在许多场合的一项任务。东北城市的语言与东北乡间有很大差别。如果读报纸，除了平卷舌时常混淆外，也许是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。但城市口语仍有鲜明的东北特色，极富有表现力。然而我忽然发现，我这时已经不会说东北话了。我所能吐出来的，只是干巴巴的书

面语，那些鲜活的东北话，那种伴我一同长大的语言如雪花入水，无踪无迹，我搜肠刮肚想起来的说出来的东北话根本不是小时候说的，而是从相声里学的。那时赵本山、潘长江、黄宏等还没有名出乡里，全国人民在大众媒体上对东北话的了解只限于相声。

后来，一个小老乡跟我讲了一件他自己的事。元旦晚会，同学们来自天南海北，照例表演家乡话，好像每个大学的新生都有此一节目，既可做自我介绍，又可娱乐大家。轮到我的小老乡时，他说：我没有家乡话，我们说的就是普通话。这种表白遭到众口同吡，尤以北京人不能容忍。我就认识一个在北京长大的中文系女孩，常以取笑我的发音为乐。东北话怎么能是普通话？众同学一定让他说东北话，他这时遇到了和我一样的困难——根本说不出来，仿佛回忆梦中的情景，伸手欲得，却无法抓住。情急无奈，他只好说：旮哈呀；你吡了吗；旮晃；大该……和我一样，也学自相声。同学们不能满意，因为他学得甚至不如非东北人学得好——不单是与相声不像，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别扭。便有几个人来推推搡搡，让他说一串长的。小老乡又窘又急，脱口而出：“滚犊子，远点骗子！”同学们一下子兴奋起来，纷纷问：什么意思？再说一遍！这情景就好比邯郸学步的寿陵少年，正从邯郸往寿陵爬的时候，忽然窜出一条恶狗，该少年便跳将起来，操起寿陵步拔腿就跑，等恶狗消失，便又颓然倒地，继续爬行。但如有好事者请他表演：假定又有一只狗来，你将如何行走？我料定这时即使真狗来了，他也未必能走出寿陵步来。小老乡

一时口吃，想了半天也没有说上来。

不过他后来一定说了出来，否则他就无法向我复述。从此我便能说两句相声之外的东北话。在冰封的语言之河中，有这样两条鱼，可以随时跃将出来，任我送人烹炸，令我的自信多少有些恢复。当时有一个在南京《周末》报社当记者的小女侠特别喜欢这两条鱼，常常把它们煮得不像样子：“滚犊儿？远山？”——尾音她竟然用升调。每次见到她我都要一遍一遍地恶狠狠地对她说：“滚犊子，远点骗子！”她就非常高兴地往我跟前凑乎：“滚犊儿？远山？”直到我离开南京，她也没有把这两条鱼养活。她的发音，语调，东北人根本听不懂，更想不到这是骂人。

当初我曾以为它们不止是两条鱼，还会成为两根网绳，收获一个鱼群。这个设想没有成功，尽管我念咒一般反复吟咏：滚犊子，远点骗子。期望能捣啊捣啊捣啊，捣出一头驴来，结果拉上来的还是两根乱绳头，完全不可持续发展。以至于我要怀疑我是否曾经会说东北话，甚至我要怀疑是否存在东北话了。

这种怀疑一直持续到放寒假才算结束。

1987年1月末或者2月初，春运期间，车站码头到处是等待回家的人群。我没有买到南京到长春的66次特快，只托人买到一张浦口到齐齐哈尔的直快。虽然要在新民换车，但毕竟能够早走几天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我这一张票上粘着两张座号。我不想浪费，就在南园海报栏贴了一张小海报。当时

1986 年底的学潮刚刚平息，任何一张海报都会激起人们的好奇和热情。便有许多笑话。记得有人贴过一张“每日必读”，四个醒目的大字引无数人涌来，却发现是一张寻物启事。我的这张海报也引起了围观和失望，也引来了一位学俄语的小伙子与我同行——我原想引个姑娘来的。那一天，我跑到留学生楼，与那位喜欢挑剔我发音的中文女孩告别，又到浦口去赶火车。不料，火车晚点七个小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自做多情地把它假定为一个重大事件到来之前的波折。我与俄语小伙儿又跑回南大，我去找中文女孩再次告别——其实我根本不想和她告别。

几个小时以后，冰河解冻的时刻终于来临。当我穿过湿冷的南京城，到达浦口，走过站台，登上了去东北的列车车厢时，一阵热风扑面而来，使我全身上下温暖起来，几个脚趾蠢蠢欲动。回忆总会把事情美化一番，使它显得有点特殊的意味。其实当时完全没有这么重大的感觉，也没有对这一时刻的预料和期待。我当时只是上了车，见车厢里面滚着热气潮气烟气，每个座位旁都有人在行李架上下活动，呼朋引类之声不绝入耳。这声音使我感到亲切——他们说的是东北话。我的语言器官顿时活跃起来，冰封半年的河道顷刻化解，鱼群不断地向上涌，闹得我嗓子直痒。就像一个会游泳的人突然被扔进水里，四肢如何能不划动？我估计寿陵那位少年爬到了燕赵边界，见到一伙寿陵人东游西逛，必能跳将起来，走起寿陵步。

一条鱼能够对它生存于其中的水有多少了解？爱因斯坦如是问。在我有了从外乡回到家乡的经历之后，我开始能以另一种方式感觉我的语言，感觉我的发音，我开始能辨别出吃和吡、人和银。那一个寒假，我常常能听见强烈的破擦音。一条河鱼游到海里，感到了海的咸；又回到河里，这才尝到河的淡。

母语这个词在现代社会中频繁出现，这是人们频繁流动的结果。总是要离开家乡，才能意识到母语，但这时已经离开母语了。

语言必定与一个特定的人群相关。

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自然想到，我的母语是汉语。如果我这样对一个外国人说，他一定会认为我指的是作为汉语代表的普通话。我的母语是汉语普通话吗？《辞海》把母语定义为“本族语”，其例为：“如汉语为汉族成员的母语”。离我要求的精度差得太远。我认识一位名叫安娜的美国女孩，是第二三代汉族移民，她的中国话说得参差不齐，需要我反复纠正。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好，每谈到加州牛肉面和苹果牌牛仔裤，她便说：我们美国没有这些东西。安娜自认为是美国人，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，当然也不妨碍我们做朋友。但是依《辞海》的定义，她的母语该是汉语，我不知道她自己以为如何，反正我不以为然。如果她有母语，我想该是美国英语。

1987年寒假回家的列车上，我听到身前身后喧闹的声音，如同置身于一个东北乡间集市，使我感到亲切。出于物

理系的思维习惯，我提出如下命题：

1. 判断两个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，要看他们在异域相遇时是否会有有一种亲近感。

2. 亲近感的强弱表明该群体凝聚力的强弱。

3. 如亲近感趋于丧失，进而产生戒备感时，该群体将解体。

4. 亲近感的强弱取决于语言的相似程度。

5. 语言必然和一个特定的人群相关。

语 与 文

称母语而不称母文，我相信这并非偶然。在我看来，语言和文字完全是两条不同的河流，尽管它们现在汇在一起，依然可以辩出它们的差异。语言和文字，是出于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。如果有一只哲学猫想要把它对生存状态的思考传诸下一代，它必用前爪在泥土上勾画；而如果是一只哲学百灵，它只能歌唱。前者产生文字，后者产生语言。人类兼具猫与百灵之能，所以既有语言又有文字。西方的语言学家认为，语言描述实在，文字又描述语言。比如 TREE，读做“吹”，指的是“树”。他们把“树”叫做所指，把“吹”叫做能指。就是说“吹”能够指明所指的“树”那个东西。同时，他们又把“吹”叫做所指，把“TREE”叫做能指，当然是说“TREE”能够指明所指的“吹”。这时，文字是语言的附庸。如果 TREE 不读“吹”，它就与“树”没有任何关系。这种观念对于拼音文字来说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但对于象形文字，则大谬不然。在我看来，人们当然可以说同一个中国字在各地区有不同的读音，但也不妨说不同的音采用了同一个字。汉字的“形”和“音”就像两条腿，支撑着它的“义”，没有主

次之分。

从起源上说，我相信文字的历史一定比语言要长。人类的舌头口腔声带演化到现在这个样子完全不是出于进食的需要，而仅仅是为了说话。人类的语言必然是和他的语言器官同时发展的。但是，在人类有了能说话的器官之前，就已经有了灵巧的双手，足以结绳记事，在空间留下符号。蜜蜂用舞蹈向姐妹们通知有关蜜源的信息，蜜蜂姐妹都能识别这存在于空间中的符号。我相信那些存在于并能够留存于空间的符号就是文字的源头。

文字虽然不晚于语言诞生，却是个发育缓慢的巨人。凡是在一个人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语言系统，都是语言先形成体系，后来才搭配上文字的。但是在现代社会中，文字繁荣起来，并一步一步地侵袭语言的世袭领域。在初民社会中，老百姓对待文字的态度如同孔子之对待鬼神——敬而远之。那时的文字与鬼神的关系也确实不一般，商朝大概只有贵族们在事情重大时才烧几块龟甲。如果一个王子爱上了一个公主，送给她一封情书——可能是一个王八盖子，她一定感到很奇怪：“有想法你唱啊，扯这干啥？”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流，情感或思想表达，只要语言就已经足够。即使是不熟悉的人，互相约定做什么事，商量一番，最后说：就这么定了——也就如签了一个合同。如果觉得事情重要，就再起一个誓——则如做了公证，公证人乃是至高无上的神，绝非现在的公证处可比——不大可能想到使用龟甲——文字。

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如果不是家中有重要人物常年在外，